

中央编译出版社

Slavoj Žiž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 著

SLAVOJ ŽIŽEK

季广茂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 著

SLAVOJ ŽIŽEK

季广茂 译

京权图字:01 - 2001 - 5333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英国 verso 出版社授权中央编译出版社
独家出版发行,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斯洛文尼亚)齐泽克著;季广茂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ISBN 7-80109-516-2

I. 意…

II. ①齐… ②季…

III. 意识形态-研究

IV. B0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7408 号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66521152(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E m a i l:cctp_edit@sina.com

h t t p://www.cctp.com.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星月印刷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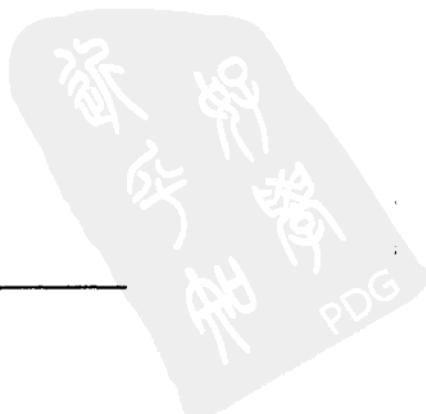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300 千字

印 张:12.625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2.00 元



齐
泽克是
闯入西方学术
界的一匹“黑马”，
他那既狂放不羁又机智敏
锐的见解将产生异乎寻常的爆破力，
阅读他的书常有一种切肤之痛。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是齐泽克的成名作和
最畅销的著作，该书一经面世，立即成为美国左翼
学术团体中“最热销的知识商品”。时至今
日，《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已经五
次重印了，它的观念已经被许
多话语形式所吸纳，也
被某些大学列入了
必读书的书
目。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齐泽克著 陈永国译



西安政院201 2 3125818 1

译者前言

一

在一个春日迟迟、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握着这本《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懒洋洋坐在校园的石凳上，懒洋洋地翻阅着。旁边不时走过同样懒洋洋的同事和同学，一片太平盛世的景象，令人倍感生活的温馨与灿烂。可读着读着，我的后背感到了一阵寒意，头皮也麻了起来。我仿佛听到了命运之神的脚步声：

死神：巴格达有一个商人，他让自己的仆人去买些食品，时间不长那仆人便跑了回来，脸色苍白，浑身颤抖。他说，主人呀，刚才我去市场，被人群中的一个女人推了一把，我回过头来，你猜怎么着？我看见推我的人竟是死神。她注视着我，还做了一个可怕的动作：把你的马借给我吧，我要骑着它远走他乡，去躲过这一劫难。我要去萨迈拉(Samarra)，那样死神就找不到我了。商人把马借给了他，那仆人飞身上马，从马的一翼抽出踢马刺，然后疾驰而去。不久商人也来到市场，他看见我站在人群中，就走近我，对我说，你今天早晨看见我的仆人时，为什么要对他做一个可怕的动作？我说，那可不是什么可怕的动作，我只是被吓了一大跳。在巴格达看见他，我感到惊

讲,因为我和他今天晚上在萨迈拉有约。

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人的命运是有“数”的,所谓的“在劫难逃”是也。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把这种“庸见”称为“迷信”,以缓解我们精神上的焦虑,以达到自欺的目的,但却无力回答这样的问题:一个人在努力逃避其命运,却最后落入了命运的陷阱,何以如此?确切些说,一个人预先知道了自己未来的命运,并极力逃避之,可结果呢,恰恰是他对命运的逃避导致了自己最终的结局——应验了他的命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悖论?如果他当初坦然面对死神,而不匆匆忙忙地飞身上马去逃避其“命运”,情形又会如何?“命运”是冥冥之中的“机关”,还是人类自身行为的产物,抑或兼而有之?

文学与现实毕竟有着“血浓于水”的密切联系,不论是文学模仿现实也好,现实模仿文学也好,都是如此。上述故事出自毛姆的戏剧《谢佩》(*Sheppey*),是著名的“相约萨迈拉”(Appointment in Samarra)。^①我马上想到了它的现实对应物,一个与此相关的真实案例。

葛宪国与李晓洁 1990 年相爱,不幸的是,葛宪国的母亲嫌李晓洁颧骨过高,长了一副“薄相”,就暗地里找人给她算了命,结果是,“五行失位,自身太旺,命中克夫伤子”,于是“棒打鸳鸯两离分”。他们先是逃到了亲戚家,李晓洁还怀了孕,他们原以为木已成舟,能得到葛宪国母亲的接纳,没想到李晓洁被强行引产,他们二人再次出逃,发誓永不回家。1991 年 6

^①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英国现代著名作家。1933 年完稿的《谢佩》是他最后一个剧本。

月13日他们来到了李晓洁的女同学高明家，一场由命运之神导演的悲剧，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滴道煤矿大半道地区第六届委会第11组的高桓德（高明之父）家里正式开演。

他们先是在高家住了一段时间，虽然受到热情款待，无奈工作没有着落，只好告别高家，另谋生路。事有凑巧，他们刚刚离开高家，高家便发生了一连串不顺心之事：家人接二连三地生病，服装店生意异常冷落，房子的后山墙被冲塌，还丢过一次包……高桓德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酷爱《易经》，于是用“马前课”给自己推了几卦，几次卦象都表示他家“晦气”太重。他怕自己算得不准，又找了一个据说算得极准的瞎子“验算”一番。那瞎子说：“你家春天时来了一对青年男女。那男的倒没什么，女的到你家时，正是‘月子’里，血污没退尽，秽气太重，扑了你家的运气。”又给了一个破解的办法：“那对青年人上秋的时候还会再来，那时，你让他们做两套红被黄褥子，灾难自然会消除，不然的话，更倒霉的事情还在后头。”果然，1991年8月17日下午，葛、李二人再次来到高家，高桓德见状对那瞎子更是深信不疑，于是开门见山地要葛、李二人做两套红被黄褥子，以求免灾。无奈葛、李二人流浪在外，手头拮据，无力购置被褥；再加上葛宪国对诸如此类的无稽之谈恨之入骨——别忘了，正是这样的无稽之谈害得他如此狼狈不堪，因此没有从命。他哀求高家高抬贵手，放他们走，待日后有钱再给高家购置被褥，被高桓德严词拒绝。葛宪国从小娇生惯养，是家里的“霸王”，现在不仅到处漂泊，而且受到如此污辱，于是他打定主意杀人泄愤。翌日晨，葛宪国凶残地一连杀害了高家三人，与李晓洁仓皇出逃。6天后他们

被捕,1991年11月18日,他们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①

一切均被“言中”,这是怎样的悲哀和不幸:第一,葛宪国的母亲找人给李晓洁算命,说她“命中克夫伤子”,结果她的孩子被强行引产,丈夫被处以极刑,当然这并非出于她的意愿,更非她的行为所致;第二,高桓德找瞎子“验算”命运,那瞎子说“更倒霉的事情还在后头”,结果丢了包括高桓德在内的三条人命。笔者在此无意为算命人的无稽之谈辩护,我们关心的是:当事人都“预先假定”了自己的命运,并极力逃避此一命运——葛宪国、李晓洁虽然对此“预先假定”不以为然,但葛宪国的母亲却以当事人的身份,极力使他们逃避其命运;结果,无一例外地应验了自己的命运;而且,正是他们的“预先假定”和“极力逃避”才造成了那样悲惨的结局,才应验了那本来就根本不存在的“命运”——老子所谓的“无中生有”,西方人所谓的“结果先于原因”^②,在这里找到了最生动最深刻的范例。如果他们当初不相信那子虚乌有的“命运”,或坦然面对之,情形又将如何?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愿触及的问题;至于答案,更是无从谈起。

① 资料出处:《迷信送了命》,《良友周报》1998年7月25日第5版。

② 参见本书正文部分:“牛津哲学家迈克尔·达米特(Michael Dummett)曾经写过两篇有趣的论文,收在他的论文集《真理之谜》(*Truth and Other Enigmas*)之中。一篇是《结果可能先于其原因吗?》(*Can an Effect Precede its Cause?*),另一篇是《造就过去》(*Bringing About the Past*)。面对这两个‘真理之谜’,拉康必定给予肯定性的回答。”

二

对于《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的作者齐泽克来说，这不是什么问题。他会借用拉康的语句告诉我们：“真理来自误认。”然后对我们解释说：“误认是人类境遇的基本特征”，“所谓的历史必然性是通过误认形成的”。在上述两种情形中，当事人最后的结局都来自对命运的误认：第一、他们认定“人生有命”；第二，他们认定人的“命运”是可以破解和逃避的；第三，正是他们的破解和逃避，才导致了他们“命运”的应验。这样的误认所导致的结果是不幸和悲惨的，但不是所有的“误认”都导致这样的结局，相反，人类的某些积极成果也以“误认”为根基。

以商品交易为例：在商品交易中，交易双方都“误认了交换的社会综合功能”，“这样的误认是交换行为得以完成的必要条件”，一旦消除了误认，商品交易就是不可能的了。“这个误认造成了意识的分裂，意识被分裂成‘实用的’和‘理论的’两种。参与商品交换行为的所有者都是‘实用唯我主义者’，他们忽略了他们行为普遍的社会综合维度，把它化约为原子化个体在市场中的偶然相遇。”每个人都是唯我主义者，都是自利主义者，都以自我为中心，这反而强化了商品交易的社会性和群体性，而且前者是后者得以形成和存在的条件。交易的主体在无意之中达到了其无意达到的目的，这就是所谓的“误认”。《镜花缘》中的君子国，人人都发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竞相让利——卖者拼命降价，买者拼命抬价，争执不休，不欢而散。可见，以维护他人的利益作为自己行为的原则，反而难以达致和谐美满的社会目标。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充满了误认——把好事当成坏事，把好人当成坏人，把历史进步当成历史倒退，把人性堕落当成“天使在人

间”……但在齐泽克看来,误认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把某些错觉当成我们历史行为的一个条件加以接受,同时把一个角色假定为历史过程的行为者”。如果没有诸如此类的错觉、误认、误解、误会,我们的行为及其结果就会呈现为另外一种面目。从这个角度说,错觉、误认、误解、误会是我们的行为的一个前提条件。

“真理来自误认”,误认常常决定人的命运。齐泽克用威廉·泰恩(William Tenn)创作的著名科幻短篇小说《莫尔尼尔·马萨维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Morniel Mathaway*)来说明这一点。^①“一位著名的艺术史家钻进时间机器,从25世纪回到了我们现在的今天,拜访和研究不朽的莫尔尼尔·马萨维,马萨维是一个不为我们所赏识的画家,但后来被发现并成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画家。这位艺术史家遇到了莫尔尼尔·马萨维,但在他身上没有发现任何天才的痕迹,反而发现他是一个徒有虚名、自吹自擂、欺上瞒下的小人,他甚至还偷走了艺术史家的时间机器,并逃进了未来,那个可怜的艺术史家只好留在了我们这个时代。他惟一能够做的,就是把自己假想成那个逃走的莫尔尼尔·马萨维,并以他的名义,画出他在25世纪时能够记住的莫尔尼尔·马萨维的全部杰作——正是他自己,才是他苦苦寻求的真正被误认的天才!”

其实最具讽刺意味,最具经典特色的还是索福克勒斯创作的

① 威廉·泰恩(William Tenn)真名为菲利普·克拉斯(Philip Klass),1946年开始以威廉·泰恩的笔名发表科幻小说,50年代一举成名。作品机智幽默,具有很强的预言性。出版过六个科幻短篇小说集和一部长篇科幻小说:《关于各种可能的世界》(*Of All Possible Worlds*, 1955)、《人间一角》(*The Human Angle*, 1956)、《时间提前了》(*Time in Advance*, 1958)、《木星》(*The Wooden Star*, 1968)、《人的平方根》(*The Square Root of Man*, 1968)、《七种性别》(*The Seven Sexes*, 1968)、《人与妖》(*Of Men And Monsters*, 1968)。

《俄狄浦斯王》，齐泽克在那里“发现了同样的结构：有人对俄狄浦斯的父亲预言说，他的儿子将会弑父娶母，这个预言借助于他父亲对这个预言的努力逃避（他将自己的小儿子遗弃在森林之中，以致俄狄浦斯在20年后与他相遇而不相识，杀了他……）而得以实现，‘一语成谶’（becomes true）。易言之，预言成真是通过将预言告知了与预言相关的人，而与预言相关的人却极力回避它，从而得以实现的：一个人预先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他竭力逃避；正是借助于这种逃避的努力，被预言的命运实现了。没有那一预言，小俄狄浦斯将与其双亲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也就不会有什么‘俄狄浦斯情结’……”

齐泽克对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的解读也颇具匠心，他把它视为文学性的《逻辑学》（黑格尔），把黑格尔的《逻辑学》视为哲学性的《傲慢与偏见》。这部作品道出了一个哲理：真理来自误认，人生的意义也在于误认。“尽管他们属于不同的社会阶级——他来自富裕的贵族家庭，她来自贫困的中产阶级——伊丽莎白（Elizabeth）和达西（Darcy）彼此都感受到了来自对方的强烈吸引力。”因为他的傲慢，也因为她的偏见，两人开始时不欢而散。“这双向的失败，相互的误认，构成了双向沟通运动（double movement of communication）的结构，在那里，每个主体都从对方那里收到了反向信息（message in the inverse form）：伊丽莎白想在达西面前呈现出一个年轻的、有教养的、充满了才智的女性形象，但她从他那里得到的信息是：‘你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心灵空虚的、会耍各种手腕的生灵而已’；达西想在伊丽莎白面前呈现出一个自豪的绅士形象，但他从她那里得到的信息是：‘你的自豪不过是卑鄙无耻的妄自尊大而已’。在中断了彼此间的关系后，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偶然事件，都发现了对方的真实本性——她发现了达西敏感、温柔的天性，他发现了伊丽莎白真正的高贵和富有才智的天性——小说到此恰到好处

处地收场,他们结了婚。”在齐泽克看来,他们初次相逢的不欢而散,对彼此天性的双向误认,是促成最终结局的积极条件。“我们不能不费吹灰之力地得到真理,我们不能说,‘如果一开始她就认识到了他的真实本性,他也认识到了她的真实本性,他们的故事就会伴随着他们的结婚而立刻结束。’让我们做一个好笑的假想吧:假如这对未来的恋人第一次相遇就相知了——伊丽莎白接受了达西的第一个建议,那将会发生什么?他们不能被爱的柔情蜜意粘在一起,他们将变成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俗不可耐的一对夫妻,一个由傲慢自大的富有男人和自命不凡、内心空虚的年轻女子组成的一对夫妻。如果我们想省略由于误认而造成的令人痛苦的迂回弯路,我们就会失去真理自身:只有‘完成’这一误认,我们才被允许接受对方的真实本性,同时克服我们自己的弱点——对于达西而言,是摆脱虚伪的傲慢;对于伊丽莎白来说,是抛弃自己的偏见。”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好事多磨”,从一个侧面,含含糊糊、朦朦胧胧地表达了同样的内涵。当然,我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成分多了些。

三

熟悉齐泽克行文方式的人阅读此书时都不会感到奇怪。齐泽克从来不会按照始、论、证、辩、结的“法定”学术程序写作。他的概念常常没有经过明确的定义,他的命题常常变幻不定,他的推理过程常常显得随心所欲,仿佛是在与朋友闲聊,仿佛是在进行自由的联想游戏。他还大量引证难入某些学者法眼的通俗文化现象(最多的是电影),甚至包括笑话(特别是黄色笑话)。尽管如此,他的博学、机智、幽默、深刻使他赢得了超越现代学术规范的特权。他在幽默和调侃之中,深入浅出地讲明了某些严肃学者或许终生都

讲不清楚的大道理，“父亲名义”、“征兆”、“征兆合成人”、“小对形”、“大他者”……这些概念经他指点，立即予人以豁然开朗之感。

因此，我们无法把齐泽克的观点整理成严密统一的观点，也无法像评点一部正规学术著作那样对其一一进行学术上的梳理。而且在齐泽克看来，这种企图本身也不再具有合法性。面对一个显在文本(*manifest text*)，我们不应该寻求其潜在意义(*latent significance*)。我们不应该问“它表达了怎样的观点？”，而是要问：“*Che vuoi?*”——“你到底要从齐泽克那里得到什么？”

但笔者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大致勾勒一下本书的内容。全书共由三部分组成，每部分又分为两章。在前两章中，齐泽克借助于精神分析理论对意识形态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在他看来，意识形态并非单纯的“虚假意识”，并非现实的幻觉性再现，而是现实本身。面对这种现实，无论是进行意识形态批判，还是采取犬儒一般的冷嘲热讽，都无能为力。那个拜物教式的公式“我很清楚，但是……”，对于理解下列问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面具并不仅仅掩藏事物的真实状态；意识形态的扭曲已经融为它的本质。”我们明明知道某些商品的使用价值近乎于零，但我们还是倾其所有地购买。如果那个商品就是我们崇拜的物神，那么毁灭它可谓易如反掌。但与其说我们崇拜商品或金钱，不如说我们崇拜自己内心深处的“幻象”(fantasy)。

关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拉康在第十一个研讨班上提出一个著名公式，它与幻象公式如出一辙： $S \diamond a$ 。由于被语言所撕裂和“阻隔”，主体把自己欲望投向小对形，以便寻回自己的“损失”，然后才能进入符号秩序。展现主体欲望的幻象，显然不同于对小对形的凝视。“ \diamond ”就是一道屏障：“幻象之‘客体’并非幻象之情

景……而是目击它的不可能的凝视。”^①

意识形态的整体感是一种想像性功能,它与理想自我(ideal ego)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无法仅仅通过解释来消灭物神和征兆。齐泽克对于排犹主义的分析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有关犹太人的意识形态图像是缝合我们意识形态系统的非一致性的一种方式。”当我们的日常经验与意识形态偏见不一致时,日常经验无法改变意识形态,相反意识形态“纠正”了我们的切身体验。在“文革”年代,我们意识形态告诉我们阶级敌人十分险恶,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阶级敌人”却几乎个个慈眉善目;我们的日常经验无法改变我们深信不疑的意识形态,相反我们轻而易举地以“伪善”二字“篡改”了我们的日常经验。为了进一步例证征兆的准外在性特征(quasi-external nature),齐泽克还用情景喜剧中“录音笑声”说明问题:此时此刻,某些人正在代我享受美好的时光。尽管我们知道那些情景喜剧无聊透顶,但我们依然看得津津有味。这种快感并非副作用,它是惟一的驱动力量,旨在满足自己从未得到满足的欲望。它类似于驱动资本主义车轮滚滚向前的剩余价值。

和恋物(拜物)的每个行为一样,隐喻性拒绝(metaphoric disavowal)和转喻性置换(metonymic replacements)的机制正在填补一项短缺(男根的缺席、现实的空隙、大他者/死亡驱力的欲望),并成为一种准现实。这种短缺不是主体自身,而是处于主体之中的某物。在弗洛伊德的术语中,这个悖论性的建构被称为概念再现(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不计成本和不考虑使用价值地收集商品,可能是一种无害的趣味,但为了国家的荣耀而不计代价和不考

① Slavoj Žižek, *Looking Awry: An introduction to Jacques Lacan Through Popular Cultur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1, 8th printing 1998, P. 172.

虑使用价值地“收集”他国领土,则是另一回事。不过,这两种征兆性建构尽管表面上并不相关,却遵循着相似的精神建构逻辑,因为它们都“缝合”了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同时又凝固了我们的剩余快感。悖论性的“缝合点”、“没有所指的能指”都是同义反复、空空如也的能指,但它们能够赋予意识形态领域以一致性:“我收集这些商品,是因为这些商品很稀少;这些商品之所以很稀少,是因为很多人都在收集它们。”还有比这更糟的:“你何以如此出众?因为我是一个德国人!德人有何特殊之处?我有雅利安血统!为什么你有雅利安血统?因为我是德国人。”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齐泽克通过不同的领域寻求悖论性的“空白点”(point-without-location)。前面提到的法西斯主义的例子,可以用来解释希特勒言语的自我指涉性的空洞性。希特勒自称“人民意志的体现者”,但“人民意志”根本就不存在。用齐泽克的话说就是,“领袖的指涉点,以及透过这一指涉点引证的用来合法化其统治的实例(人民、阶级、民族),并不存在。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党和领袖只能通过拜物教的代表而存在,也只能存身于拜物教的代表之中。”

最后,齐泽克勾勒了拉康处理实在界的独特方式。实在界究竟是一种现实存在,还是一种永远可望不可即的“物自体”?它是抵抗符号化的某种事物,还是根本就不存在的被人视为无所不知的主体,或者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某个原因。如同希区柯克的“麦格芬”?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齐泽克反对过度简单化的解释。在他看来,实在界本质上“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空隙,是标志着某种核心不可能性的符号结构中的空无”;它是“一个本身并不存在的原因——它只能呈现于一系列的结果之中,但总是以某种扭曲的、位移的方式呈现出来。如果实在界是不可能的,那么,要借助于其结果而去把握的,恰恰就是这种不可能性。”在齐泽克看来,这

正是“后结构主义者”与拉康的区别之所在：在后结构主义者那里，主体被描述为主体化过程的结果；在拉康那里，主体被设想为“对实在界的应答”——因为所指永远无法找到能够完全代表它的能指，于是一个空隙（我们称之为主体）被创造出来。

在最后一章，齐泽克提供了这种不可能之物的另一个范例，那便是崇高：“有关崇高的悖论在于：在现象的、感性的体验客体与自在之物这两者之间的割裂，原则上是难以逾越的。”“崇高因而是客体的悖论，在再现的领域里，它以否定的方式提供了有关无法再现的事物之维的图景。”正是在这一理论中，西方文学批评界找到了英雄用武之地。^①

四

笔者以为，本书的最大贡献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后现代世界的“征兆”。它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试图借助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重要的经典母题进行崭新的解读——“征兆性解读”。

以“意识形态”为例。意识形态理论在西方源远流长。在西方，意识形态理论得以产生的基本动机是剔除意识上的蒙蔽——“祛蔽”，并确立科学的观念意识。虽然如此，也只是到了近代，人类才真真切切感到了意识形态的存在。从历史发展看，在齐泽克之前，“意识形态”概念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特拉西阶段、马克思阶段、曼海姆阶段、列宁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阶段。“意识形态”是特拉西在18世纪末的首创，他用“意识形态”一词命名一个新学科——观念学。马克思采用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分析

① See Oliver C. Speck, 'What Do You Really Want From Žižek?', *Film-Philosophy*, Volume 2, 1998.

19世纪德国哲学,使“意识形态”概念史发生了革命性转折。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就是“虚假意识”或“错误观念”,它源于社会角色的阶级立场:不同的人由于在经济生产中所处的位置和利益关切点不同,故而形成不同的“观念”——既包括真实观念又包括虚假观念,意识形态是特定的社会阶级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扭曲真实的现实关系的结果,是“利令智昏”的真实写照。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的,还有两位欧洲早期的社会学家——默斯卡和帕莱托,他们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途径与马克思并不相同,却得出了和马克思极其相近的结论,并因此被人称为马克思的复仇女神。

曼海姆在两种意识形式之间做出区分:一种是没落阶级的思想偏见——“意识形态”;一种是新兴阶级的思想观念——“乌托邦”;同时他在两种意识形态之间做出区分:一种是具体意识形态,一种是整体意识形态。具体意识形态是个别人的观念和表象,目的在于掩饰个人的私利;整体意识形态是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社会团体的意识形态,目的在于塑造特定的世界观,确定理论思维的总体构架和主体的认知态度。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整体意识形态,因为只有它才能揭示出一个时代或一定团体的思维结构、一个社会的主体的认识态度是怎样形成的。曼海姆之后,盖格尔把意识形态看成是以“理论”的形式掩饰着的原始情感、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这样,意识形态的精神分析便渐渐浮出水面,而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对意识形态理论的透视,使我们发现了另一片生机勃勃的新天地。

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成为曼海姆之后意识形态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在弗洛伊德那里,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并不表现在它是某个特定阶级出于利益的考虑而对现实所作的扭曲,而是来自个体与团体无意识间的“自欺”,是人类为了